

崛起的大国需要匹配的地位



7日,霍克在“2014APEC中国日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摄

(上接B01版)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于在区域内发挥更大角色作用的预期将会增加。”11月7日上午,鲍勃·霍克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未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相关的亚太战略格局的调整,已是呼之欲出。2014APEC峰会,无疑是在主场展示这种调整的最佳时机。

阻碍在哪?

利用APEC这个平台,领导人在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好的可以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平台是很重要的。

但现实往往比理想要复杂很多。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区域的权力格局调整,往往面临旧势力的重重阻碍。

环顾亚太,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美国,二战后从未离开过亚洲,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加入APEC和WTO的道路上,美国始终如影随形。

美国的存在,使得亚太地缘环境趋于复杂,各方博弈色彩浓厚。

“只要美国认为存在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感觉不安全。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人没有预测到的,因此会感到巨大的恐惧。”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这种深层次缘由作出了精辟分析: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把全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25年前的美国和中国一样,并非APEC的最初创建者,而是后来才被引入其中。

鲍勃·霍克坦言,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中,美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以至于人们把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这种领导地位看成理所当然,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的领导力已经给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成功,而且他们很难想象,美国在亚洲会担当另外一种类型的角色。”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孤立政策。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主导者是美国和苏联,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郑永年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此后始终处于被美国牵扯和平衡的状态。

实际上,加入APEC后,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潜在对手,“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两种论调,也会周期性地在美国言论中泛起。

其结果之一,是美国试图绕开中国,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之外,单独成立门槛更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事实上,前者是美国亲自倡议并在APEC框架下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合

作框架,后者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美国是后来加入的。因为担心过度自由化伤及本国经济,起初,中国反对FTAAP。

11月3日下午,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仅是中国,当时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反对这个协议,“相当于把它打掉了。”

此后,美国认为TPP符合其“高标准高门槛”的要求,开始介入并大力推行TPP。这种思维,使得亚洲这个大家庭,面临着“分裂”的挑战,与如今这个国际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理念的差异,由美国主导、未包含中国、以TPP为载体的“亚太轨道”,和由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获得东亚国家支持,以RCEP为载体的“亚洲轨道”之间的分歧,似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是个大国,30多年来不断崛起,已成为亚太区域内不容忽视的国家。

显然,这一次,中国使用“东道主”的身份,正在很好地利用APEC这个舞台。

“其实说到底,APEC是一个外交场合,为亚太各国领导人每年见面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盛斌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说,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很重要,“利用APEC这个平台,领导人在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好的可以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日本这些大国。从此次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上就可以看出,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平台是很重要的。”

成为领导者与旗手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慢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要的棋着。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让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够实现。

如果说鲍勃·霍克25年前的“预言”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前景的乐观判断,再次来到北京的鲍勃·霍克这次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和中国应该作为平等大国,在新的亚太战略秩序中“发挥重大且平等的领导力作用”。

“当年美国推出FTAAP,更多是基于其自身贸易自由化的考虑,但英文单词Community(共同体)的首字母是大写,是机制化的,与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不符。中国提的是community,是类似社团的群体,是一个亚太大家庭,对亚太各国均持开放态度。”盛斌介绍说。

换言之,美国推出的机制化色彩的FTAAP,门槛较高,脱离亚太各国发展程度不一、贫富有别的事实。而现在中国重提FTAAP,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是基于“建设开放包容的新亚太”,而非为了一国发展。

盛斌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为促进亚太一体化发展做出了各种努力,

比如之前推出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等,一系列动作均围绕一体化进行。

毫无疑问,关于亚太一体化的任何设想,都需得到本区域内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而建立开放、渐进、自愿、协商等基础上的亚太大家庭,APEC无疑是最佳的平台。

这种情况下,作为此次APEC东道主的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整合。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慢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要的棋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更大的多边的东西,弥合两条道路的分歧和差别,把所有的分歧都整合到一个大框架下。”盛斌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说,“中国想把这次做成里程碑式的会议,不在区域一体化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动手,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的。这次在这一点上,中国恰恰选对了最具挑战性的核心问题,为将来亚太各国的深入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因而,此次APEC会议三个方面的议题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让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够实现。”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显然,亚太一体化还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约一万亿美元,但只有约一半能够解决,亚投行的作用在这里就发挥出来了。”11月7日上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APEC发展理事理事长张力军,用现实的例子展望了互联互通的亚太新前景,比如,跨境教育协议达成以后,APEC成员伙伴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时候,门槛降低了,可以在低成本条件下享受更多优质教育。

“中国崛起带来庞大的利益,周围国家必然要求分享。”郑永年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摆上中国和亚太大多数国家战略远景的大平台上,“通过一种远景式的合作,给人们注入信心,更会影响企业、行业的长远判断。另外,还会对建筑、钢铁及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一些利好消息。”谈及APEC这个大平台的作用,盛斌如此认为。

中国对外需的渴求日益强烈。

“前一个阶段,做好企业就行,比如生产一颗纽扣,出口到其他国家,就能做成很大产业。但现阶段,要求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为人家做便利交流的工作,而不再仅仅是生产一颗扣子的问题。”张力军认为,这就要求企业升级换代,“就是常说的,调结构,转方式。”

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机遇,同样适用于亚太其他国家,而伙伴关系一旦建立,双边乃至多边都将从中受益。

APEC在实现上述蓝图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历经30多年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更加具有改革和创新意识的国家,中国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亚太各国赋予的重任。

国家智库为APEC而生

本次APEC领导人会议周活动期间,最忙碌的学者中,应该有南开大学教授盛斌和刘晨阳。他们总会因自己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而频频接到各家媒体的采访电话。中国APEC研究院和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这两个在实际业务中由一套班子运营的机构,其建立、壮大和发展,为我们了解中国在APEC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

本报深度记者 张文 刘志浩
实习生 杜瑞 吕倩 梁舒翔

先有中心后建“国学院”

1995年,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一个专门为研究APEC相关问题而成立的学术机构。

此时,距离中国加入APEC不过四年时间,而距离APEC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仅有短短两年。

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993年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首倡。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要回答关乎世界和亚太地区发展这样的大问题,需要学术界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为了落实“APEC领导人教育倡议”,由中国外交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即现在的商务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即现在的教育部)和南开大学共建的国家级智库机构——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应运而生。

为什么是南开?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也是最近才在教育部一位高官那里得知选择标准,“首先必须有厚重的研究基础,第二个在北京或北京附近的城市,还有一点,就是必须有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

中国APEC研究院的建立,则和2001年上海APEC会议密不可分。

2002年4月,中国APEC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以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既有基础为依托,与国家有关部委、大型企业、兄弟院校与科研机构有机结合的官产学研三方合作机构,是落实2001年上海APEC会议成果的重要举措。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钱其琛强调,加强官产学研三方合作对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乃至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他高度评价APEC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中国会继续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APEC研究院是国家级的研究院,充分体现了官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APEC研究中心目前已向外交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提交17部,共计500余份APEC问题咨询研究报告。

参与本届会议成果设计

2014年,中国在时隔13年后再次成为举办APEC会议的东道主。

APEC研究院与中心全面参与了APEC领导人会议成果设计与具体方案的政策咨询研究,并完成“中国主办2014年APEC会议咨询研究”、“APEC茂物目标回顾与展望”、“第八届APEC旅游部长会议专项调研”、“2014年APEC会议主要议题对中国工商界的影响”等重大研究项目,提交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相关政府部门。

APEC研究中心刘晨阳教授和李文韬副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高官会及相关系列会议。

今年5月,APEC第二次高官会期间,APEC研究中心在山东青岛主办了“2014年APEC研究中心联席会议年会”。

“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倡议推进亚太地区学术网络的合作。”盛斌介绍,目前APEC的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中国今年想把这样一个非机制化的会议往前推一步,建立一个亚太学术网络,这是“APEC中国年”的亮点之一。“这个学术合作网络要有成员单位,有秘书处,有正式的运行网页,能把各国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整合起来。希望在本次的领导人宣言中对此能有所提及与认可。”

自贸区研究成为新领域

除了APEC问题咨询研究之外,APEC研究中心近年来又承担了新的研究课题。

“客观来讲,近年来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进程有所放缓,没有最开始建立时那么强劲,甚至有些发达国家对APEC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却迅速发展起来,中国也不例外,这也开辟了APEC研究中心另外一块重要的研究领域。”盛斌说。

受商务部的委托,APEC研究中心陆续承担了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冰岛、瑞士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谈判辅助工作,成为国内自由贸易区研究方面的权威学术机构之一。

“APEC研究中心的定位就是学术研究 with 政策智库,而且是为国家专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咨询。”盛斌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高质量与高水平的国际化智库,它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同时强调目标导向的对策性应用研究。”